

“辛亥革命与东南社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葛涛 褚晓琦

“辛亥革命与东南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10月24日至26日在上海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复旦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协办。参加会议的海内外学者共73人，其中上海以外的学者7人，分别来自北京、南京、金华、宁波、无锡、安庆，另有台湾学者一人提供了论文。国外学者共有3人，其中日本学者两位，韩国学者一位。研讨会共收到论文37篇。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施岳群主持开幕式，社联主席李储文致开幕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厉无畏出席会议并讲话。武克全、熊月之、杨国强、张宪文、沈渭滨、陈绛、朱宗震、黄逸平、杨立强、冯绍霆、刘学照、唐力行、潘君祥、丁凤麟、戴鞍钢、朱敏彦、沈雨梧、郭绪印、忻平、邹逸麟、苏智良、施宣圆等参加了研讨会并作了报告和发言。

爆发于90年前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历史性的政治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辛亥革命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变革运动。在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在内的东南地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首都设在南京，上海则对于辛亥革命的胜利起了关键性作用。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着辛亥革命的性质、辛亥革命与东南社会总论、东南社会有关阶层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和表现、辛亥革命中的东南地区以及其他一些专题，进行了探讨。

一 辛亥革命的性质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是历次关于辛亥革命会议少不了的议题。本次会议也谈到了这个议题。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认为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三个里程碑之一。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折点；辛亥革命并非是一场全民革命，而是由在当时具有历史先进性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国，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使命。南京临时政府构建了现代国家的雏形，展现了现代中国的图景，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如何看待辛亥革命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这一问题上，张宪文指出，中国社会的根本改变不可能通过一次暴力革命完成。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具有传统和现代化二元社会的特征，北洋军阀的统治是传统、现代两种政治斗争的结果。辛亥革命之后出现的社会问题并不能归咎于这次革命本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朱宗震研究员提出，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应从清末实施新政时开始，史学界历来对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发展程度估计过高。当时资产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很少，力量薄弱，不能成为一支独立和成熟的政治力量，因而辛亥革命并未到达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度。

二 辛亥革命与东南社会

本次会议的主旨是集中讨论辛亥革命与东南社会。所谓东南，大体指江苏、浙江、安

徽、福建和上海，会议涉及的议题有东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风俗、人物等。

复旦大学历史系沈渭滨教授从社会史研究的角度，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真正起点。他从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变迁进行分析，认为东南地区从整体上一直是晚清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也是社会转型机制准备得相对成熟的地区。沈渭滨认为，从社会转型的角度上说，辛亥革命才是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起点。因为随着辛亥革命，中国社会才发生真正的结构上的变化。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熊月之提出，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运动中，上海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特殊的市政格局、独特的人口结构，其舆论的宣传、起义队伍的构成、起义的准备、起义的方式、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关系，都显示出独特的风格，在全国的地位极为特殊。他从五个方面进行讨论：一，革命舆论基地；二，“假孙中山案”的象征意义；三，两派联系形成统一战线；四，特殊市政格局与特殊风格；五，上海起义在全国的分量。他将上海在辛亥革命史上的特点归结为四条：一，革命舆论深入人心；二，革命派、立宪派结成统一战线；三，工商业者占重要地位，资产阶级色彩强烈；四，起义以比较公开的形式进行，县城不战而下。他将上海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也归纳为四点，即：一，革命舆论基地；二，革命指挥机关所在地；三，江浙地区起义的关键所在；四，新生革命政权的经济支柱。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周育民教授提出，上海独立以后，江苏境内出现了“一省三督”，军政分府林立的情况。江苏都督程德全、庄宽在江苏省临时议会的支持下，通过取消道、府行政设置等措施，坚持推行“江苏统一”政策。沪军都督府虽然在全国革命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地处江苏“下邑”的行政地位，使它在清帝退位之时，陷入了“事实当去”的窘境。而主张分省的江北都督虽然得到江北议会的支持，但是在袁世凯的严令和程德全的掌控下，只得宣告取消。而南京留守府在将兵权分别移交陆军部和江苏都督后，也宣告取消。革命先人只推翻清政府而不争权利的政治信念、清帝退位前后“江苏统一”、“南北统一”的有力的舆论环境、“江苏都督”的首长意识、江苏省内部的地缘政治关系以及袁世凯坚持原有行省制度的强硬政策，都促成了江苏省境内的“革命”迅速地被结束了。原作为苏松太道驻地的上海在道台撤消之后，行政地位反而下降了，自治结构上海市政厅要求按西方自由都市办法省政府，市、县分论、市辖县的新行政体制由此开始萌发。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廖大伟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对迄今还是研究空白点的辛亥革命与上海政治地位大幅提升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辛亥革命为上海政治地位大幅提升创造了机遇和条件，上海在辛亥革命期间的实际贡献和巨大作用确保了上海政治地位的大幅提升；列举了辛亥革命期间上海政治地位大幅提升的具体表现，并分析了原因。最后总结了上海政治地位大幅提升的重大意义，提出上海政治地位的大幅提升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开展和深入，加速了中国民主现代化的进程；对上海城市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改变了国内政治格局，提高了东南社会的政治地位，提高了江浙政界、工商金融界的政治地位，提高了上海的国际地位。

三 辛亥革命与有关社会阶层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郭太风教授提出，上海商会的绅商体制瓦解于辛亥革命期间。之后形成的上海总商会增强了独立性，在维护商民利益方面体现出一些民间色彩，但政治上的买办性则趋于明显。他认为，处于绅商领导体制之下的上海商务总会清未政局所持的基本立场是赞成立宪改良，不愿投入革命。而具有买办身份的一些人却在辛亥革命中颇为活跃，反映出买办对绅商体制的不满情绪极为强烈。买办与民族资本家在谋取或维护商业利益方面有共同之处，两者身份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相互兼容或转化，然而买办性未必随着买办投资民族工商业而消失。买办与“一身二任”者通常有崇洋畏洋的心态，买办性决定了他们在总体上

反帝不力。

上海档案馆研究馆员、研究室主任冯绍霆以上海光复前后，上海绅商广泛参与地方行政，成立商团、都督府为例，提出上海绅商是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力量，并列举了李平书在其间的活动情况。从李平书在二次革命时所表现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他认为上海绅商对政权的基本要求便是维护地方安宁。他最后指出，应重新考虑上海绅商在辛亥时期的作用，他们是革命派的同路人，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相互结合；尽管在清末特殊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上海绅商对地方事务取得了相当多的发言权，但并不等于说上海绅商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一个市民社会。

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元隆提出，辛亥革命时期上海知识界国家观念的成熟，与上海的特殊地位密不可分。上海知识界的国家观念，紧扣民族救亡和民权革命的主题，这与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后提出的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不谋而合，体现了时代的脉动；作为思想启蒙的一部分，成为辛亥革命国家制度的先导，而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又为近代国家观念广泛播扬提供了某种制度层面的保证。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方平提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各种非官方化的组织机构、社会公共事业、公共活动场所及社会运动的兴起，上海在社会层面产生了某种较为成熟的公共领域，这一领域独立于国家行政框架之外或处于其边缘，不依赖于政治权力而运转，在发育过程中依靠非官方的民间力量，逐渐构建起一套相对独立的规制化的整合机制。这套机制的有效运作，使公共领域的整合功能不断增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级——市民阶级因之在上海城市社会结构演变过程中逐渐崛起。并从公共领域的整合机制、市民阶级的社会构成、市民阶级的社会认同三方面进行了论述。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邵雍分析了上海帮会的三种类型以及组织系统的特点，并叙述了帮会在上海光复过程中的贡献，如筹款、招募军事人员、临阵冲锋，以及与革命党人的相互影响等。提出帮会是一股既有巨大活动能量又最不安分的很难控制的社会势力。帮会是中国近代病态社会的产物，它的意识形态属于封建文化的范畴，具有极大的历史惰性。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革命党人在辛亥时期并没有处理好与帮会的关系问题，而这并非上海独有的现象。

复旦大学历史系戴鞍钢、杨立强教授提出考察辛亥革命与在沪海外华侨归侨的关系，特别是革命后他们对上海政治的变革、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所做的努力，有助于对那段历史有更全面的认识，对华侨归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有更多的了解。论述了辛亥革命后的上海出现了华侨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潮，以及他们在近代文化教育领域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宁波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王慕民教授对旅沪宁波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工商业企业家在清末以上海为活动基地，开展反清革命活动的事迹进行了论述，提出了他们在上海、宁波光复过程中的贡献和历史功绩。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李斌论述了旅沪宁波人作为一个社会集团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旅沪宁波人士以工商界人士为主体，因而其参与、支持革命的首要途径便是财力资助。赵家谨、赵家艺兄弟因倾力帮助孙文而被传诵一时，而在上海光复以及随后的沪军都督府的建立过程中，全部由旅沪宁波人士集资创设的四明银行更是在提供军饷和财政支援上予以积极的支持。宁波旅沪人士在革命中的贡献和作为是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的表现，成为民族凝聚力和社会动员的基础。

无锡市人民政府研究室汤可可副主任，苏州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李明从晚清时期苏州社会结构的变迁入手，对苏州市民公社的产生、前期的职能和作用等进行了论述，探讨了苏州市民公社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提出苏州市民公社作为地方商民的基层自治组织和商会的社区性基层组织，它的许多态度和主张是与商会相一致的，是诞生在中国传统社会土壤中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新事物。

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博士研究生川原胜彦提出，辛亥革命前的上海“行栈”的形成和发展对当时代表日本商业资本的三井洋行打入中国市场起到划时代的作用，最终为近代日本走向现代化打下了商业上的基础。具体情况是：三井洋行经过对上海“行栈”的仔细考察，发现了它在中国市场上的优势，从而决定废除以往采用的买办制度，积极地推行“行栈”（即中国人跑街），直接打入中国市场。而当时日本政府有关部门也对“行栈”做了考察，指出了“行栈”在商业活动上的优势和重要性。论文得出结论，从上海“行栈”与三井洋行的关系来看，近代日本商业资本之所以能够顺利地打入中国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通过采用“行栈”制度积极地推动“中国化”（即本地化）的结果。

日本明治大学副教授高田幸男题论文论述了目前研究尚少的江苏教育总会。他提出，1905年成立的江苏学务总会，即江苏教育总会的前身，是江苏省的核心教育组织，其后成为江苏全省的中心政治组织，对于辛亥革命在江苏的开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高田幸男教授的论文运用了具体案例对学务总会的形成及其作用进行了说明和论证。

清帮在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占有它独特的位置和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郭绪印教授指出，在清末漕运改道之后，清帮的客观环境和经济地位发生了改变，使它逐步转化成为一支直接或者间接对抗清政府的力量。因此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清帮在东南、上海地区也一度成为革命的“同盟军”。但由于革命党没有能力及时改造清帮，清帮于民国初期在东南、上海等地给革命带来了一定的危害。郭绪印从以下事实论证了他的观点：（1）漕运改道造成东南地区清帮由拥清转向反清；（2）江浙太湖“梟党”成为革命党的同盟军；（3）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清帮的表现。

四 辛亥革命与社会生活、文化变迁

上海历史博物馆房芸芳从社会生活领域发生的巨大变迁，论证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从女性缠足的封建恶习在辛亥革命之后最终走向完结，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生活领域中引起了巨大的变化。至此，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社会生活可以说是从真正意义上完成了近代化的过程。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变迁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上海作为一个近代崛起的开发性口岸，成为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的先锋性标本，活跃于辛亥前后的革故鼎新的潮流之中。

《大陆报》是美国在华创办的一份英文日刊，于1911年8月29日在上海正式出版，革命党人曾经促成了它的诞生。创刊未满两月，武昌起义的炮火便打响了。上海历史博物馆胡宝芳分析了从1911年10月12日到10月31日期间《大陆报》上刊登的有关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的消息，考察了这些消息的来源，对最能反映报纸倾向性的短评进行评析。最后得出如下结论：《大陆报》所体现的完全是在华英美人士“一方面要保持现状的稳定和平；一方面要达到根本改进变革的最后目的”的意愿。《大陆报》的这种态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外的公众，为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奠定了基础。

“地方自治”思想是清末民初中国政坛上一直论争不休的一个命题。《东方杂志》是1909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刊的大型综合期刊。上海书库出版社编辑的《从“地方自治”到“联省自治”——〈东方杂志〉在辛亥前后的“自治观”简析》的论文，以《东方杂志》为主要研究文本，对以张元济、夏曾佑、杜亚泉、钱智修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治言论进行了简要而精辟的评述。

《解放日报》社高级编辑丁凤麟介绍和评价了上海时事新报社编印的、搜集了编辑当时革命军政府发表的各种文献的《革命文牍类编》。《革命文牍类编》提供了辛亥革命运动全方位的信息资料，为中国历史保留了在辛亥革命高涨时期，也就是武昌起义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这段革命高涨时期的极其珍贵的革命文献资料。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敏副研究员将她对辛亥革命前后上海报刊市场的研究情况，即：（1）迅速成长的报刊市场；（2）报刊经营中的非商业化现象；（3）报刊的大众化趋势与市场的扩张；（4）上海报刊的销售网进行了总结、归纳。指出上海能够拥有发达的报刊行业，除了因为租界的存在，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拥有比较成熟的文化市场，一批文化人能够依赖市场而生活，因而可以独立地思考，坚持独立的主张，独立地发表政见，成为稳定的革命力量。最后她强调了革命宣传在推翻清朝斗争中的重要性，指出它至少可以与军事斗争所起的作用并驾齐驱。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刘学照教授论述了晚清至辛亥革命期间上海舆论中的话语变化。上海是国内舆论转换中心，庚子年间开始，上海舆论中的话语转换就已发生。其间“《苏报案》”的发生，更是促成了上海舆论风气为之一变。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后，上海舆论与革命党人的喉舌《民报》相呼应，到了1909年前后，则更是在政治批判中呼唤革命的到来。他总结道：清末十年间，上海舆论报刊中出现了许多反映新情况的新话语，这些新话语推助了传媒间的话语革新和话语转换，促使上海乃至全国言论氛围和政治气候的转变，最终促成了武昌起义和共和革命高潮的到来。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傅绍昌教授提出，作为辛亥革命关键地区的上海，在民主精神的巨大高涨中，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的传介出现了新势头，成为思想领域中的一个亮点。虽然这些宣传和介绍尚不成熟，没有形成思想运动，但它毕竟表明经过辛亥革命洗礼的中国人民追求真理的精神，并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广泛传播打下了基础。并介绍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的情况，中国社会党的成立经过及其活动，以及《东方杂志》等报刊对社会主义思潮。

韩国东义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河世凤研究员对1905-1919年间《申报》上刊登的广告进行了解读，研究了这一时期广告的变化与时局、社会的变迁相联系，探讨了商业广告与社会思潮与文化的关系。

五 其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谢俊美教授回顾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革命党人内部就未来共和国的政体之争，以及在《临时约法》中对此的体现。虽然《临时约法》实际上无意之中形成了一种变相的总统制，而当时的各个政治集团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否认它的存在，仍然执著地遵循着责任内阁制的原则办事。认为民初革命党人在政体设计上的反复以及存在的不足，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理论建设方面尚未成熟，这给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官僚政治势力以可乘之机，直接成为导致辛亥革命胜利了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朱宗震研究员讲述了黄炎培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他与同盟会、立宪派的关系。同盟会和立宪派人员有交叉关系，并非黄炎培一人，这也是后来在辛亥革命中上海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基础。

安庆师范学院闵传超教授对皖籍革命志士吴樾的思想进行了评析，介绍了吴樾关于排满、革命、暗杀之间关系的言论和想法。

浙江师范大学沈雨梧教授不同意史学界将章太炎列为地主阶级反满派的说法。他分析了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的反满言论及其由排满到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思想，认为章太炎是当之无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化，即由传统的“士”向具有近代科学知识和人文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转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国强研究员对这一转化进行了论述和评析。作为一个群类，20世纪最初的知识人是由新政催生的。这些游学和进入学堂的读书人，在清末的最后十年里，被“兴学育才”的时潮孵化出来，而后又

“各负所学以自岸异”，一群一群的汇入改造中国的时潮之中，以东洋和西洋的学理呼风唤雨，以东洋和西洋的学理推波助澜。在举子士人的千年历史之后，这是中国知识人的一个蜕变期。从庚子到辛亥，蜕变中的知识人曾经为天下造跌宕起落之势，而笔下的汪洋恣肆转化为世间的激荡驰骤之后，他们中的多数人又成了身不由己者，纷纷为跌宕起落之势裹卷而去。十年兴学造就了与传统农村社会日去日远的知识人群体，然而他们中的多数人又很难融入城市社会，这正是新一代知识人在特殊历史环境下所体会到的悲凉。杨国强研究员认为，这一代知识人在思想、言论、行动上所表现的“偏激”，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具有合理化的成分。杨国强研究员在研讨会上还就章太炎和吴越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作用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当时反清团体之间发生争论属于正常现象，不能将反清反满人士统统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文与章太炎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反满斗争，章太炎侧重从文化内容进行反满的宣传活动，写的文章比较有思想深度，对当时的社会进化论，也指出其存在的两面性。杨国强研究员认为，应该避免用今天的思想去理解当时社会环境下历史人物的情感和思维。至于吴稚，他的思想、言论、行为则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中存在的一种情绪，在 20 世纪初年，他们身上集中了传统的侠气、高涨的士气，以及燃烧的个人意志。

教育改革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举措，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建立各类新式学堂，培养了数百万名不同于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新学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马自毅从一个新的角度研讨了这个问题。她阐述了由于新学堂、新学生的出现而引发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反响与社会问题，指出从更深远的层面看，当时就已存在的假西学而行己私，或者似懂非懂、反叛一切传统的心理和行为，埋下了日后中国思想与“运动”的根子。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忻平教授在与赵泉民共同阐述了 20 世纪初期，伴随着新知识阶层的崛起及其他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转换和主体意识的觉醒，加之帝国主义扩张侵略的加剧与国内专制统治的衰败，这几方面的结合使得新知识分子形成了改变社会现实的“尚武意识”。这种意识为辛亥革命的发生营造了社会氛围，提供了心理准备，聚集了群众力量。但是，人们在宣扬“尚武精神”之时，却忽略了对与之相关的政治军事力量的归属和把握，最终带来了 20 世纪最初 20 年的混乱和内战。

上海历史博物馆徐亚芳从人的生活层次、素质层次、能力层次、关系层次方面论述了辛亥革命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伟大意义，指出辛亥革命给中国人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行为方式和新的社会秩序，使中国人由定型的儒家思想和僵固的社会制度中逐渐解放出来，转向现代人。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华强教授对辛亥前后青年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三个特点，即男女平等、重视女子教育、主张社会解放分别进行论述，指出这场运动的规模与声势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内容也在不断地丰富。这在理论与实践上为日后中国妇女规模更大的解放运动打下了基础。

1912 年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借款案曾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长期以来，历史学家集矢于盛宣怀，认为他从个人私利出发与日本签订合办汉冶萍借款合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易惠莉教授却提出，孙中山是此次与日本签订合办借款合同的主动者，而盛宣怀只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对孙中山直接参与与日本签订合办汉冶萍借款合同案的研究，不仅不会毁损孙中山作为民族伟人的形象，相反会加深对孙中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推翻清王朝革命活动的困难以及日本乘机攫取中国利权的政治社会场景，也包括对辛亥革命性质等等的认识，她对相关史料进行了极为详细的梳理。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军对莫理逊图书馆的形成、馆藏图书的数量和种类等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他指出，莫理逊图书馆收藏了多种珍贵的有关中国的西文书籍，而辛亥革命后中国由于时局的混乱，最终导致该图书馆被日本人收购，形成今日东洋文库的基础。这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这的确是一大憾事。

上海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钱宗灏介绍了该馆新近整理出版的《二十世纪初之中国印象》摄影集的情况，对其中珍贵的历史照片进行了讲评。

上海历史博物馆段炼通过对鲁迅《哀范君三章》的评析，指出诗中不仅有鲁迅对故友范爱农的深切缅怀，更饱含着鲁迅作为一个革命思想家对辛亥革命这场 20 世纪初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重大事件的反思。

本次研讨会是东南地区学者关于辛亥革命与东南社会研究成果的集中检阅。研讨会研究了许多新的领域和课题，比如具体地域、具体社会群体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等，对于拓展新的研究范围、加深对辛亥革命意义的认识，推动辛亥革命的整体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许多议题是老题目写出了新意，在吸收学术界成果的同时，融入自己新的思考和研究，见人所未见，这方面的成果，大面积地深化了对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

本次研讨会的论文多是从具体问题讨论辛亥革命，“小题大做”，以小见大，这在辛亥革命研究史上是一大进步。从所选题目来看，有 14 位与会者主要从社会学入手，这反映了当今学术界研究兴趣的转换，也是学术研究务实的表现。本次研讨会充满着新的气象，如开幕式简短，论文讲究规范，学术讨论崇尚平等和实事求是，年轻研究人员的加入，会议筹备方面的周到和细致等等。总之，这是一次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地方特点、准备充分、讨论认真、学术水平较高的成功的讨论会。